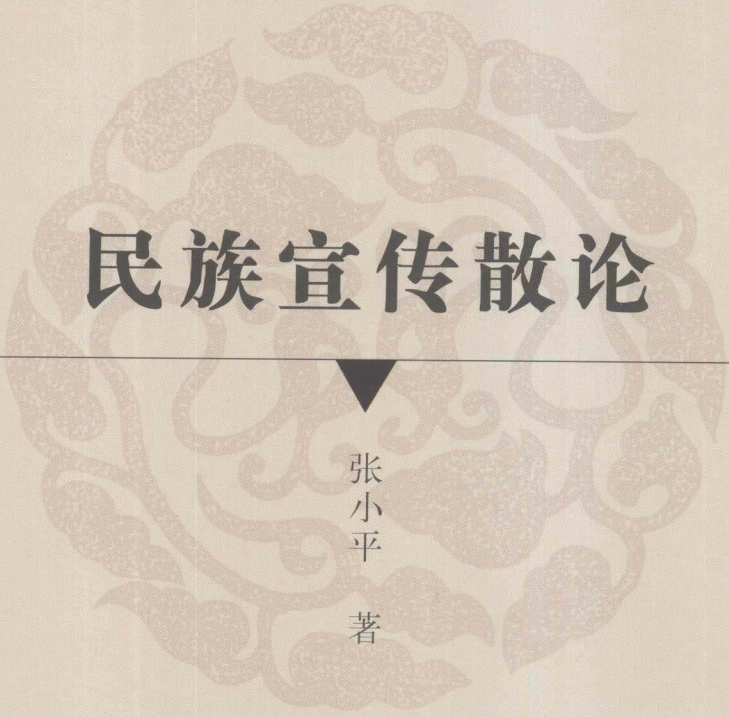


张小平

著

# 民族宣传散论

中国藏学出版社



# 民族宣传散论

---

张小平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良 封面设计:李建雄 版式设计:天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宣传散论/张小平著.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5

ISBN 7-80057-498-9

I. 民... II. 张... III. ①少数民族-广播工作-中国-文集

②少数民族-电视工作-中国-文集 IV. G22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0247 号

---

## 民族宣传散论

---

作者:张小平

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刷: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2.25

字数:315 千

插页:2

印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

印数:1500 册

书号:ISBN 7-80057-498-9/Z·356

---

定价:24.00 元

## 作者简介



张小平、男、汉族、1942年2月生于黑龙江省宾县。高级记者。

1965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文专业，同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1995年7月作为中直机关首批援藏干部到西藏工作，任西藏广播电视厅副厅长。西藏民族学院兼职教授。2001年7月返回北京。现任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学术委员、专家组成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学会副会长、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委员会副会长。兼任《中国藏学》杂志执行主编。

40年来，先后30余次进藏采访、工作。还曾多次到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省的藏族地区以及新疆、内蒙古、广西、海南、云南等省、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采访。参加过珠穆朗玛峰和纳木那尼峰的登山采访活动。

主要作品有《雪域在召唤——世界屋脊见闻录》（专著）、《走向21世纪的西藏》（主编）、《同在阳光下》（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副主编）、《纳木那尼》（合著）等。部分新闻、散文、报告文学和论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西藏日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广播》、《中国西藏》、《西藏文学》、《西藏民俗》等报刊上发表；一些作品收入《西藏散文选》、《目击西藏》、《见证百年西藏》等书中；部分作品被译成藏文、英文、日文、乌尔都文和世界语。是大型纪实性电视连续剧《西藏风云》的制片人之一。

1994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并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





版式设计 ○ 天朗  
封面设计 ○ 李建雄  
责任编辑 ○ 冯良

# 献 给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创办五十五周年

## 序

杨波

张小平同志撰写的《民族宣传散论》即将出版,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业务研究的新成果,值得祝贺。据我了解,目前,我国专门研究和探讨民族宣传的论著并不多见。这本书也可称作是一本填补空白之作。

民族宣传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宣传门类。它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统战、信息、文艺、娱乐等领域的内容为一体,以多种民族语文为传播载体,面向国内外的各民族听众、观众和读者,拥有广大的受众群体。民族宣传的政治性、敏感性、特殊性、知识性,以及它所具有的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地域情调,使它在众多的宣传门类中独树一帜,因而受到广泛的关注。

民族宣传是一个需要付出辛劳和奉献的事业。由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边疆,交通、生活等方面的条件相对较差,在这些地区开展工作,要深入草原牧区,攀登高山峻岭,经历酷暑严寒,还要克服语言障碍,适应风土民情。显然,从采访到编辑、制作节目要付出更多的辛劳,从事这一工作的编辑、记者要耐得住清贫和艰苦,要有更多的奉献和牺牲精神。

民族宣传的研究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天地。对这一领域的探索、思考与升华,起步相对晚些。但却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和开拓机遇。近年来,中央台民族中心的藏语部、蒙古语

部、朝鲜语部、维吾尔语部和哈萨克语部都先后出版了集体论文集或个人专著,涌现了一批有思想、有深度、有见解的文稿,涉及翻译、播音、主持、编辑、采访以及事业管理等诸多方面,这是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张小平同志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富有经验的编辑和记者,三十多年来,他多次出入西藏,还几乎走遍了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对祖国的民族大家庭和民族宣传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甘于寂寞,不畏艰险,勤奋刻苦,持之以恒,采写了大量具有广播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作品,并且在工作之余,对民族宣传的理论进行了不懈的探讨,这种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民族宣传是一个正在发展的事业,天地广阔,前景可观。本书对民族宣传的概念、性质、任务,民族宣传的历史,民族宣传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以及编辑、采访、西藏宣传等相关领域都有一些理性思考,具有开创意义。作者写的许多书评、影视评论和随笔,又以另外的风格展现了他对民族宣传的理解与情怀。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理论又能推动实践更加具有自觉性和创造性。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推动民族宣传的研究工作。

当前,我国民族宣传和其他领域的宣传一样,面临着空前的发展机遇。祝愿民族宣传更加接近生活、接近实际、接近群众,更加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民族同胞喜闻乐见、乐听、乐读,成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2005年1月

---

本文作者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 自序

## ——难忘的岁月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个小册子是我有关民族宣传、西藏宣传的一批文章的结集。1999年底,我在拉萨布达拉宫脚下曾经写过一篇回顾自己编辑、记者生活的长文。看了这篇文章,大家就能明白这本小书的来历。请允许我打破常规,用这篇文章作为本书的“自序”。

从1965年到2000年的35年间,是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称中央台)生活和工作的难忘岁月,而其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民族部(现升格为中央台民族广播中心)度过的。可以说,民族、宗教和西藏问题宣传是我编辑、记者生涯的主旋律。

### 我成了中央台的一员

1965年9月5日下午,我手持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的派遣证第一次踏进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大门。十分钟后,我被告知分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工作。此时,在广播大厦一层的音乐厅里,正在召开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纪念大会,丁莱夫书记、梅益局长在会上讲了话。

后来,我才知道,中央台原计划安排我到正在筹建的中央台

驻西藏记者站工作,因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个计划被搁置下来。

新闻部的工作是难忘的,它使我全面接触和熟悉了广播新闻的编辑和发稿业务。有一段时期,我曾充当联络员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取当天的重要新闻稿件和报纸大样。记得那时,我每天凌晨四点钟就要乘汽车或摩托车离开广播大楼,通过宁静的长安街,前去执行任务。我的这个工作被当时的编辑和播音员同事们叫做“大使”。清晨的时间过得很快,有时时间来不及,就在报社的印刷厂里给编辑部打电话,口述版面情况,十几分钟后,中央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就播出了这则版面介绍。此时,我心里自然是很快乐的。更使我难忘的是,有许多次在新华社国内部等候周恩来总理签发的新闻稿,当我拿到稿件,看到周总理墨迹未干的签名,看到他认真批改的文字,特别是他精心修改的标点符号,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一经历,对我后来的编辑、记者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每当我写稿或审阅别人的稿件时,对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格外留意。

### 筹备中央台少数民族语言广播

中央台从1950年5月22日至1960年12月的10年间曾经开办过藏、蒙古、维吾尔、壮、朝鲜5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节目。这一节目受到了周总理的直接关注,许多对西藏播发的重要稿件都是他亲自安排的。由于当时广播局领导决策的失误,1960年底,中央台的民族语言广播被撤销,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大多返回各自的民族地区。1962年7月,在青岛举行的民族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提出了严肃批评,并要求中央台立即恢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节目。我们几位同学(李春山、杜清初、杨燕杰、毕东芝、赵聪敏、盛鸿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央台参与完成这一重大使命的。

“文革”开始后,我和几个同志曾给周总理写信要求加快恢复民族广播。不久,广播事业局得到回音,并安排我们分别前往

各自所学民族语言的地区做有关筹备工作。这样,“文革”初期,我曾先后两次前往西藏,到拉萨近郊的堆龙德庆县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学习群众语言,还参加了部分广播稿件的翻译工作。

1970年3月8日,我接到中央台军代表的通知:“民族部的事情,中央批下来了,从今天起请你脱产参加民族广播的筹备工作。”从此,我就与民族宣传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与黄凤锡同志一起先后起草了恢复民族广播的筹备方案和调干方案后,我于当年4月赴湖北沙市中央民族学院五七干校和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学院选调藏语播音员和藏语翻译。记得赶到西藏民院时,得知学校师生已迁往长武农村并正在延安参观,我和同行的崔克智、贺俊文又立即赶往延安与他们会合。虽然最终没有找到合适人选,但却使我获得了此生惟一的一次到延安的机会,那种朝圣式的感受,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在筹备恢复民族广播的过程中,耿跃、王辉等老同志也参加了有关工作。

同年3月下旬开始,中央台先后派出5个调干小组分别前往内蒙古、新疆、西藏和云南选调民族语言广播干部。6月底,我同中央台驻河南记者站记者梁长洲(后在河南南阳地委宣传部任职)和驻湖北记者站记者阮观荣(后任中宣部新闻局广播电视处处长、中国记协国内部主任)乘飞机前往拉萨,承担到西藏选调藏语广播干部的任务。

西藏调干历时一年,期间的生活艰苦、紧张而难忘。当时的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非常支持调干工作,指示组织部门敞开大门,让我们随意挑选。为了选好干部,我们先后到拉萨、山南、日喀则、那曲、昌都等地开展工作,光是日喀则我就去了5次。那时,西藏的交通十分困难,有时找车就要等四五天。记得昌都之行更是艰苦,时值11月下旬,正是西藏最冷的时候,我和刚从汽车16团调来的旺堆同志乘坐装有篷布的大卡车在川藏公路上颠簸了整整7天,同行的是西藏民族学院的毕业生,大家在气温极低的车上唱歌,聊天,说说笑笑,十分愉快。最使我忘不了的是,藏族姑娘格桑卓玛怕我冻着,一上车就把在内地买的一顶

猫皮帽子送给我,让我戴上。后来我才知道,这顶帽子是她给自己的男朋友买的,这使我感受到一种汉藏民族间的深厚情谊。写到这里,我仿佛又回到了30年前,内心又涌起一种难以忘怀的激动。

漫长而艰苦的工作终于得到了回报,第一批选调的藏语翻译、播音员于同年12月底起先后乘汽车经青藏公路到达北京,他们是:旺堆(翻译,现为中央台驻西藏记者站站长)、罗永东(翻译,现名罗桑贡觉,曾任藏语组组长,现任西藏山南地区政协副主席)、索朗多吉(翻译,曾任民族部副主任,现为中国藏学出版社社长)、昌决(女,播音员)、曲珍(女,播音员)、焦凤枝(女,翻译)、陈杰盛(翻译)、罗旦(翻译,现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编译处处长)、边巴次仁(播音员,返藏后曾任西藏日喀则市市长,现为西藏山南地区行署副专员)、罗桑江白(播音员,现在拉萨市群艺馆工作)、旺久(翻译,曾任民族部副主任,现为西藏日报副总编)、卓嘎(女,翻译)。

为了扩大调干线索,在此期间,我和阮观荣同志还曾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工作。在康定城里、折多河畔,我们走访了许多翻译机构和藏族干部,了解了康巴地区的翻译情况,增加了对四川藏区的认识。跑马溜溜的山下第一次留下了我的足迹。

值得提及的是,西藏调干结束前,时任中共中央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天宝同志(藏族)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并就中央台藏语广播开播后使用外语借词的原则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其基本原则是“尊重历史习惯”和“名从主人”。这个方针一直延用到今天。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准备,中央台从1971年5月1日起陆续恢复了蒙古、藏、维吾尔、朝鲜语、藏语节目,创办了哈萨克语节目。按照原定的计划,中央台还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开办壮、彝、傣三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中央台的藏语广播是1973年1月1日正式恢复的,同年1月17日,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了藏语广播正式播音的情况。至此,经过长达11年的努力,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终于得以落实,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广播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 难忘的编辑生活

从1970年开始恢复民族语言广播,到1995年赴西藏执行援藏任务,我在中央台民族部整整工作了25个年头。期间,大部分时间做编辑、记者工作。

编辑和发稿是民族广播最重要的日常工作。25年间,我在广播大楼里经历了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时刻,编发或签发了已无法精确统计字数的稿件。由于国家电台特有的地位,使身处这一岗位的我们总是能最先获得国内外的重大新闻,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新闻生涯经常处于极度紧张和兴奋之中,这是一种与亲爱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兴奋,一种对政治和社会高度关注和敏感的兴奋。

这一期间,我和同事们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办好中国式的民族广播的道路。除了加强时效性、针对性和可听性之外,特别值得说明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民族部曾先后派人去新疆、西藏、内蒙古、延边等地,采录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节目,播出后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各族听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在民族文化领域率先进行“拨乱反正”,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做出了贡献。

再一个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就是创办汉语民族专题广播节目。1981年6月1日中午,中央台《新闻和综合节目》中的《民族专题》在中央台的电波中第一次升上太空。这次节目播出的是我采制的专访:《唱支山歌给党听》,由藏族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讲述自己的成长历程。节目开办初期,我和编辑贾庭贤同志一起做这个节目的编辑,老贾曾在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二十多年,是个名副其实的“老西藏”、“老黄牛”,他为这个节目呕心沥血,编出过许多好稿。他的工作态度给了我深刻的影响。在我赴西藏执行援藏任务不久,他突然患心脏病去世,这使我十分悲痛,马上发出了到西藏后的第一封唁电。现在,由《民族专题》



发展而成的《民族大家庭》节目已经是中央台小有名气的节目之一,拥有一个数量不小的听众群。实践已经证明,在国家电台举办汉语民族专题节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广播节目的特色之一。

民族部是一个民族大家庭,我在这里结交了许多兄弟民族的朋友,除了工作上的大量交往之外,藏历年、古尔邦节、肉孜节、春节、国庆节、五一劳动节都是我们欢聚的难忘时刻。

### 在中国民族大家庭的土地上漫游

在民族部期间,民族、宗教、西藏问题的宣传在我的面前展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也为我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认识中国的民族问题、宣传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的广阔舞台。在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怀抱里,我增加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受到了兄弟民族殷殷亲情的长久熏陶。而在中国民族大家庭土地上的大量采访活动,更使我直观地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切身地感受到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及其丰富内涵,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也增加了更多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

25年间,我曾经多次参加全国人大、党代会以及许多全国性的民族、宗教工作会议和重大活动的采访工作。我曾经为乌兰夫同志录下了他生前最后一次录音讲话,聆听过他对中央台民族广播的期望和要求;我曾经几次采访阿沛·阿旺晋美副主席,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他的教导和关怀;我曾经多次采访班禅大师的政治和宗教活动,倾听过他的许多精彩议论和独到见解;我还采访过大量的各民族的先进人物(包括劳动模范、作家、歌唱家、画家、科学家、教授以及各级领导干部),感受到了中华各民族前进的脉搏。在编辑部,我与前方记者和中央台驻各省市记者站的同志配合,还先后完成了平息拉萨骚乱、十世班禅大师圆寂等有关西藏重大事件的报道工作。

我曾 8 次去内蒙古采访。在锡林郭勒草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目睹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美景象,看到了蒙古族牧民的生活场景,同“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妹妹玉荣作过长时间的交谈。

我曾 10 次去新疆采访。在吐鲁番,我经历了“火洲”的酷热,品尝了葡萄、哈密瓜的甘甜,领略了一千多年前新疆的古老文化;在喀什,我徜徉在维吾尔族风情里;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我进入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看到了石油工人的风采,感受到了“活着挺立一千年,死后站立一千年,倒下又是一千年”的“胡杨精神”;在伊犁、博乐、叶城,在博斯腾湖、果子沟以及天山、昆仑山脚下,都留下过我的足迹。

我曾 11 次去云南采访。大理的苍山洱海和白族民居,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神韵,德宏的傣族农村情调,楚雄的恐龙文化遗存,怒江大峡谷中的怒族、傈僳族同胞,迪庆梅里雪山下长眠的我的那些中国和日本的登山战友,都使我永远铭记在心。而昆明钢铁总公司的十万钢铁工人,马玉康总经理的气魄和胆略,还有那令人敬佩的“昆钢精神”,更是使我在采访的同时得到了精神境界的升华。

1991 年春天中央台推出的大型系列报道《边城行》,是我在中央台期间参与的一次重要报道活动。对党中央在周边地区实行开放政策的高度政治敏感是这次报道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简洁明快的语言、丰富而具特色的音响、5 分钟的时间设置,以及报道组全体成员朋友般的亲密合作,成为这次报道活动引人注目的特点。在组织和参加这一报道的过程中,我从王燕春(后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胡家麒(现为中央台北京记者站站长)、胡志坚(现为中央台新疆记者站站长)、郑凯(现为中央台天津记者站站长)、肖航(现为中央电视台《影视同期声》节目制片人)、那森宝音(蒙古族,现为中央台内蒙古记者站记者)等同志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中央台工作的 30 年间,我还曾经去吉林、黑龙江、海南、广西、四川、贵州、青海、甘肃、湖南等省、自治区内的民族地区采

访。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我先后采访过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满、回、壮、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俄罗斯、塔吉克、土、撒拉、裕固、门巴、珞巴、傣、白、怒、傈僳、阿昌、彝、哈尼、基诺、土家、苗、侗、瑶、羌、黎、畲、高山、水、东乡、纳西、京、赫哲等 40 多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

### 雪域西藏留下了我的足迹

由于工作的需要,从 1965 年到 1995 年的三十年中间,我曾先后 15 次进藏,完成台里交办的采访、调干和筹建中央台驻西藏记者站等任务。这些工作,使我获得了在雪域高原长时间驻足的机会,同时,也使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西藏民族的宗教、文化和人文自然景观,感受西藏的色彩、魅力和诱惑。

采访是我进藏生活最动人、最难忘的篇章,他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曾受命在 1987 年拉萨骚乱后的第二天从北京飞到西藏,观察和报道拉萨形势;我曾受命作为中央代表团的随团记者采访西藏和平解放 40 周年……这些政治性极强的采访活动使我直观地感受到了“西藏问题”的国内外背景及其特殊复杂性,并且有机会接触和走访西藏自治区的历届领导人,其中包括陈明义、天宝、任荣、阴法唐、伍精华、多杰才旦、多吉才让、热地、江村罗布、陈奎元、郭金龙、杨传堂等同志,对西藏工作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我曾先后到拉萨、日喀则、山南、那曲、林芝、昌都、阿里等西藏的主要城市和地区采访,走过了青藏、川藏、新藏、滇藏和中尼 5 条通往西藏的公路,在西藏的城镇、草原、牧区、边境、哨卡、工厂、矿山、学校、寺院和各级党政机关广泛走访,对西藏的山山水水和生活在这里的世界上最能吃苦的民族有了真真切切的了解。1991 年和 1992 年两次进藏采访中与孔繁森同志的交往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西藏采访的许多经历都使我难忘,这里只能简要地记述几

件事情。

位于拉萨以北 100 公里的羊八井是西藏最有名的地热田之一,我国最大的地热电站就建在这片热土之上。1980 年夏天,我曾在羊八井大开发的前夕到这里采访,那蒸气弥漫的热水湖,那定时迸发的间歇喷泉,以及念青唐古拉雪山脚下的那苍茫而壮阔的自然景观在我的内心深处激起了强烈的震荡,我在西藏的神奇和磅礴面前彻底倾倒了。

1982 年末,我与许多记者的思路相反,在严冬前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纳木湖畔(湖面海拔 4718 米)采访。在那里,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西藏牧民的坚忍不拔和乐观豁达。那几天晚上,我和记者旺堆把牛粪火烧得旺旺的,大通铺上垫了四个棉褥子,身上盖了四床棉被。这里实在是太冷了,夜晚的气温达到摄氏零下 40 度左右。记得那次采访,上下山都是骑马,因为汽车无法在冰雪覆盖的山路上行进,我穿上了所有能穿的衣服,仍然冻得发抖。下山时,突遇“马失前蹄”,马的前腿掉进老鼠洞(西藏的地老鼠很多,所以山路上到处都是老鼠洞),一刹那,我就像“射出的箭一样”(旺堆后来这样形容我)突然间从马上飞了出去,摔到两米多远的前方。说来也奇怪,当我苏醒过来之后,我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马怎么样了?”事后我才醒悟过来,因为马是从当雄县委借来的,我怕马出事了不好交代。接下来就是回拉萨,我和旺堆在公路边等了好久才爬到一辆装满货物的卡车上。就这样,我们趴在车篷和货物之间的缝隙中,一动不动地熬过了六七个钟头,带着满脸满身的灰尘回到了拉萨。经医院检查,我的肋骨挫伤,回北京后整整疼了半年。

在西藏翻车的遭遇也是奇特的。1980 年夏天,我和西藏台记者晓明(现为西藏广播影视局副局长)乘汽车去位于中国、锡金边境的亚东采访。车行至距古城江孜几十公里的一处山路时,天上下着毛毛雨,车子拐弯时突然打滑,一下子冲出路面,滚向河谷。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把我们惊呆了。好在我的头脑还清醒,我数着,汽车翻了三个滚,心想,如果车越滚越快就完了。可就在这时,汽车四脚朝天地停了下来。车里静悄悄的,过了几秒